

DOI:10.19361/j.er.2018.05.12

经济发展进程中的需求结构变迁

——中等收入阶段需求结构变化的跨经济体比较分析

瞿亦玮 张 瑛*

摘要：研究和分析需求结构的变迁，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为克服目前流行的国民收入核算框架在需求结构分析中的缺陷，本文基于经济发展理论的长期性视角，利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中22个经济体1995-2014年的连续投入产出数据，在最终需求分析框架中刻画了各经济体在中等收入阶段需求结构变迁的特征。结果表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各经济体需求结构不断升级，表现为从生存型需求主导向发展型需求主导转变；中等收入经济体的需求结构与后发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呈现趋同态势；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预计未来中国涉及民生的生存型和享受型需求占比将有所上升，而政府主导的发展型需求占比将有所下降。

关键词：中等收入阶段；最终需求；需求结构；跨经济体比较

一、问题的提出

供给总是相对于需求的。在当下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中，供给侧之所以要进行结构性改革，是因为供给结构不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这种供求结构失衡是中国近年来经济增速逐年减缓的重要原因之一（黄益平等，2013；林毅夫，2015；李建明，2015）。因此，无论是从理论上研究供给侧结构性问题，还是从实践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都离不开需求结构。可以说，研究和分析需求结构的变迁，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然而，人们对需求结构存在不同的认识和理解。如果不仔细地辨析和研究需求结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可能出现偏差，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顺利推进。

在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讨论中，我们注意到，中国学者大多从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基于国民收入核算框架来研究中国的需求结构变动，并由此研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实际上，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是一种不涉及经济结构、只考虑总量的理论，它关心的问题是实际产出为什么会偏离潜在产出。相对于研究潜在产出的长期理论而言，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是一种短期的理论。在凯恩斯理论体系中，需求是决定性的因素，而供给被隐含地假定为能够自动地适应需求变化。显然，在这样的理论视野中，我们是不可能讨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的。基于研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我们应该关注的需求，是与供

* 瞿亦玮，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邮政编码：430072，电子信箱：yiwqu@whu.edu.cn；张瑛（通讯作者），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邮政编码：266100，电子信箱：yzhang@ouc.edu.cn。

给相对应并直接影响供给的需求。这是一种长期的视角,是经济发展理论而不是经济波动理论的视角。

依据一般的经济学理论,需求可以划分为中间需求和最终需求。所谓最终需求,是经济体对不再进入生产环节而直接消费或消耗的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中间需求则是由最终需求派生的并服务于满足最终需求的生产供给的需求。中间需求的变化服从于最终需求的变化,因此我们更加关注最终需求的结构及变化。

目前国内外学者研究最终需求结构的特征及变化大致有两个分析框架:国民收入核算分析框架与非国民收入核算分析框架。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最终需求由消费、投资和出口构成(马晓河,2010;刘瑞翔等,2011;沈利升,2011;Ahmed et al.,2018),在此基础上分析最终需求结构的特征及变化。这种分析框架仍然来自凯恩斯理论,其弊端不再赘述。非国民收入核算分析框架主要见于刘世锦(2015,2018)及其研究团队。刘世锦(2015)构造了终端产品(Gross Final Products,GFP)分析框架。2018年,他们基于GFP分析框架发布了《2035: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与路径》研究报告,将中国与部分典型发达经济体的广义消费结构进行了比较。本文在刘世锦(2015)的基础上对GFP做了修正,并进一步定义了本国对国内和国外生产的终端产品需求,亦即经济发展视角的长期性需求。

需求及其结构的变化是引致供给结构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Echevarria,1997;Kongsamut et al.,2001;Comin et al.,2015)。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类,中国已经从中低收入国家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需求结构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本文试图通过描述和解释各经济体在中等收入阶段的需求结构特征及变化,并比较分析仍处于中等收入阶段与已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两类经济体的需求结构特征,归纳出需求结构变化的一般规律,从而为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事实依据和方向。

二、分析框架、样本与数据

依据经济学定义,总需求指的是在既定价格水平下全社会对产品和服务的总支付能力。1987年国家统计局拟定了《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平衡测算方案》,该方案将总需求核定为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国外需求之和(吴丕斌,1991)。除此之外,总需求的核算还存在如下多种口径:按照社会总产品口径核算,总需求=货币资金形态的需求+非市场性需求;按照GNP口径核算,总需求=投资需求+商品和劳务消费需求,等等(刘志彪、王国刚,1989)。然而这些核算方式均未能区分最终需求与中间需求,例如饲料厂生产的饲料被农户购买,在国民收入账户中,即统计意义上属于居民的最终消费,但在经济意义上却属于农户的中间需求,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最终需求进行明确界定。

如前所述,所谓最终需求,是经济体对不再进入生产环节而直接消费或消耗的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中间需求则是由最终需求派生的并服务于满足最终需求的生产供给的需求。两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是:

首先,二者都是总需求的组成部分。实际上,总需求等于中间需求与最终需求之和。

其次,最终需求是直接的,最终需求直接引发最终产品的制造,同时最终需求所购买的产品不再进入生产领域;中间需求是派生的,为满足最终需求的生产供给及分工的发展而引致的需求。

最后,最终需求的变化引致产出结构的变化,中间需求的变化归根结底服从于最终需求

的变化。

目前,学术界分析需求结构普遍基于 GDP 支出法的国民收入核算框架,即分析经济体在一定时期内所生产的产品和劳务的最后使用部门(即居民、企业、政府和出口国外)在需求中所占的比重。因此,用支出法核算 GDP,就是核算一个经济体在一定时期内居民消费、企业投资、政府购买和净出口这四方面支出的总和。但是,如果把这种核算方法中的“支出”直接等同于需求,就不是长期意义上的最终需求。在不考虑供给及其结构的情况下,短期的支出可以等同于短期的需求,但是,研究长期的供给及其结构变迁问题时,不能以短期宏观理论的“支出结构”代替长期发展理论的最终需求结构。

刘世锦(2015)把 GDP 中不再直接进入下一个生产过程的产品称为“终端产品”(Gross Final Products, GFP),它包括居民消费、政府消费和非生产性投资。通过 GDP 扣减生产性投资和净出口可获得 GFP。本文在刘世锦(2015)的基础上对 GFP 进行了修正,并进一步定义了本国对国内和国外生产的终端产品需求(Gross Domestic Final Demand, GDFD),即 GFP 加上进口中的最终产品。我们做了两点修正:

第一,相对于刘世锦(2015)的“终端产品”GFP,本文根据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的行业分类对住宅作了细分,分别是作为耐用消费品的“居住”和作为投资品的“房地产”。后者更具有金融属性,不能纳入到最终消费中。

第二,本文关注的是一个经济体的最终需求及其变迁,因而,在涉及国际经贸往来时,我们更关注国内消费者对国外产品的需求(进口),而不是国外消费者对本国产品的需求(出口)。

基于本文的研究目的和上述分析,除非特指,下文所说的需求是指本国对国内和国外生产的终端产品需求(GDFD)。

欧盟委员会编制的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为本研究提供了数据上的有力支持。该数据库以各经济体发布的间断的投入产出表为基础,结合国际贸易数据,通过 RAS 法将其外推成连续的投入产出表(Timmer et al., 2015),包括世界投入产出表、国家(地区)投入产出表、社会-经济账户表、环境账户表四大部分 13 个子表,涵盖了 43 个国家和地区 1995-2014 年的投入产出数据。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中国发布的竞争型投入产出表,WIOD 数据库中的投入产出表属于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它区分了国内产品和进口产品中的中间使用和最终使用,也提供了进口品在国内各行业的分布,这使得本文的分析框架得以成行。

基于 GDFD 的概念和组成,本文将 WIOD 数据库提供的行业进行如下处理:首先,将 2016 版的 56 个行业(行业分类 ISIC Rev.4)与 2013 版的 35 个行业(ISIC Rev.3)尽可能对应,以保证数据连续性;其次,剔除不属于终端产品的行业,如采掘业、化工产业、金属冶炼业,以及金融中介、批发零售租赁、投资性质的房地产等;再次,保留最终使用中的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最后,将剩余行业按最终消费品的性质和内容进行归并。

处理完成后,我们得到最终需求的 11 个组成部分,包括食品、服饰、居住、能源消耗(水电气)、教育科研、公共服务(行政、国防、社保、健康等)、出行、电子设备及邮政通讯、住宿餐饮、文化娱乐和其他个人服务(汽车修理、法律会计咨询、市场营销、计算机服务等)。根据消费目的对需求进行分类,并参考刘世锦(2018)的文献,我们将这 11 个部分归纳到生存型需求(食品、服饰、居住、能源消耗)、发展型需求(教育科研、公共服务)和享受型需求(出行、电子设备及邮政通讯、住宿餐饮、文化娱乐、其他个人服务)三大类中。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曾经经历和正在经历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体。因此,我们剔除 WIOD

数据库中在考察期内持续处于高收入阶段的经济体,最终得到 22 个经济体 1995–2014 年的连续数据,其中包含 16 个欧洲经济体、4 个亚洲经济体和 2 个美洲经济体。依据世界银行对经济体收入阶段的界定^①,各经济体在 1995 年及 2014 年所处的收入阶段如表 1 所示。可以看到,在 2014 年时有 14 个经济体已处在高收入阶段,其中爱沙尼亚等 12 个经济体曾经历过中等收入阶段,因此我们得以完整刻画需求结构随收入阶段提升的升级路径。在本文中,我们将 1995 年以后跨入高收入阶段的经济体定义为后发成功追赶型经济体,以区别于英国、美国等先发经济体;将印度等 8 个在 2014 年尚未进入高收入阶段的经济体定义为中等收入经济体。

表 1 考察期内样本经济体所处收入阶段^②

经济体	1995 年	2014 年	经济体	1995 年	2014 年
印度	低收入	中低收入	波兰	中低收入	高收入
印度尼西亚	中低收入	中低收入	俄罗斯	中低收入	高收入
中国	低收入	中高收入	斯洛伐克	中低收入	高收入
保加利亚	中低收入	中高收入	捷克	中高收入	高收入
罗马尼亚	中低收入	中高收入	希腊	中高收入	高收入
土耳其	中低收入	中高收入	克罗地亚	中高收入	高收入
巴西	中高收入	中高收入	斯洛文尼亚	中高收入	高收入
墨西哥	中高收入	中高收入	马耳他	中高收入	高收入
爱沙尼亚	中低收入	高收入	匈牙利	中高收入	高收入
立陶宛	中低收入	高收入	葡萄牙	高收入	高收入
拉脱维亚	中低收入	高收入	韩国	高收入	高收入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WDI 数据库。

三、需求结构演进的一般特征

为了存在与发展,人必然有各种需求。根据 Maslow (1943) 的需求层次理论,人在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需求;随着人的发展,人的需求也存在一个由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的过程。在宏观层面,一个经济体大多数人所达到的需求层次以及不同层次需求所形成的需求结构,与该经济体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直接相关。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需求结构将不断升级,这必然要求供给结构也做出相应调整。

本部分的目的在于刻画和描述需求结构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而变化的基本特征。

(一) 三类需求的变化

在详细分析需求结构的构成及变化之前,我们首先刻画三大需求,也即生存型、发展型和享受型需求占比随一国生产力水平提高发生的变化(见图 1)。考虑到各经济体到达一定生产力水平的时点不同,而单位美元在不同时点又具有不同购买力,我们没有使用世界银行用来界定各经济体收入阶段的人均 GNI(现价),而是以 2010 年不变价美元衡量的人均 GDP^③ 作为生产力水平的度量,以保证跨期经济体之间生产力水平的可比性。

^①<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DATASTATISTICS/Resources/OGHIST.xls>.

^②印度尼西亚于 1998 年从中低收入阶段跌回低收入阶段;韩国同年从高收入阶段跌回中高收入阶段。

^③数据来自世界银行 WDI 数据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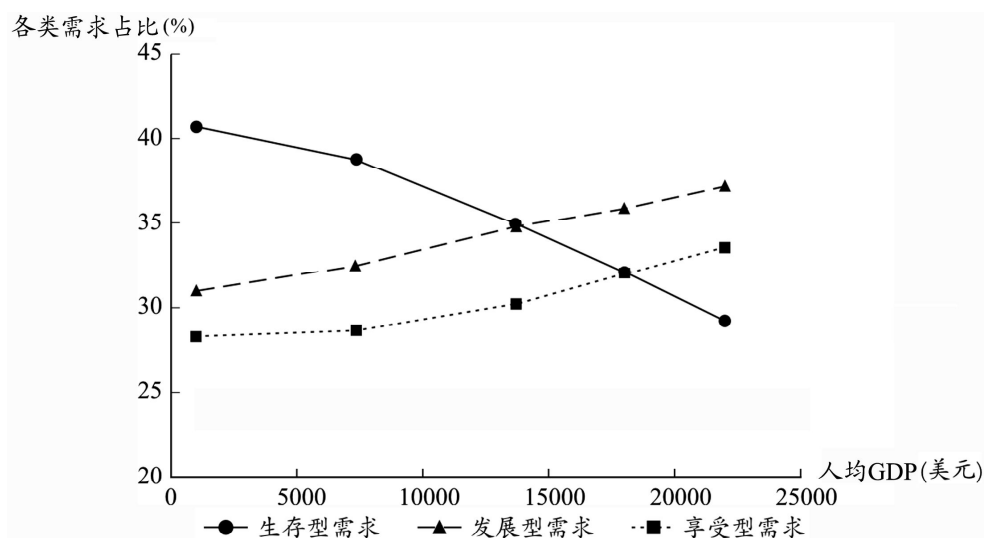


图1 不同类型需求占比的变化趋势

从图1中可以观察到如下事实:

第一,生存型需求占比随收入水平提高而下降。在人均GDP较低时,生存型需求的比重为40%左右,在三大需求中比重最高;而当人均GDP达到18000美元后,生存型需求的比重被享受型需求反超,成为三大需求中占比最低的部分。

第二,发展型需求占比逐渐上升。在人均GDP超过13500美元后,发展型需求成为最终需求的主体,并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在三大需求中持续占据主流。

第三,享受型需求占比的上升速度先慢后快。当经济体处于中低收入阶段时,享受型需求的提升不显著;随着经济体进入中高收入阶段,享受型需求占比的上升速度逐渐加快。这一特征与生存型需求相反。

随着收入水平提高,一个经济体的需求结构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表现为从生存型主导逐步向发展型、享受型主导转变。其原因在于,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当居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得到充分满足后,更多的支出被用于自身的发展和生活质量的改善,发展型和享受型的支出增长快于生存型,导致三者相对比重发生变化。

(二) 跨越收入阶段时需求结构的变迁

为了深入探究经济体在中等收入阶段的需求结构变迁,我们选择与中等收入阶段相关的三个节点,即经济体跨越低收入阶段(进入中低收入阶段,以此类推)、中低收入阶段和中高收入阶段的时点^①,分别刻画最终需求11个组成部分在跨越期的变化(见表2)。

跨越低收入阶段时,食品需求是生存型需求的“绝对主力”,比重高达20.21%,超过服饰、居住和能源消耗之和。表明在经济发展初期,各经济体居民会优先满足其温饱需求。在收入阶段向上攀升的过程中,生存型需求的4个部分呈现两种相反的变化:食品和服饰需求占比逐渐下降,而居住和能源消耗占比不断上升。其中,居住支出占比从8.41%增至11.44%,可能的原因是地价上涨带动房屋租金上涨和居民追求更高质量的居住环境。随着收入水平提高,经济体的能源需求量在快速增加,能源消耗占比从2.25%上升到4.45%。

^①少数经济体在不同收入阶段之间反复变化,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取考察期内该经济体最后一次跨越的时间。

发展型需求以政府消费为主导。教育科研方面,跨越低收入阶段时,教育科研需求的比重为 10.19%,其中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的差距不大,这从侧面表明经济起步时期政府对教育和科研的投入力度并不大。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政府开始重视并加大了科教投入,成为该项需求的绝对主体。公共服务方面,跨越低收入阶段时,政府已是公共服务供给的主要支出方。经济体跨越至中高收入阶段时,政府逐渐具备了能力和意愿来进行社保、医疗支出等方面的制度安排以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福利国家的雏形开始显现,公共服务占比上升。

一个有意义的现象是,跨越中高收入阶段时,居民消费在两类发展型需求中的比例都有不同程度的上升。例如公共服务占比提高的 1.2 个百分点中,有 1.1 个百分点来自居民消费而非政府消费的增加。可能的原因是,当经济体进入高收入阶段后,非营利组织(NGO)发展繁荣,政府承担的部分公共服务被其分担。

享受型需求方面,最突出的现象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出行消费占比下降了:从 9.80%逐步下降到 6.31%。可能的原因,一是收入增长速度超过了出行消费的增长速度;二是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汽车等交通工具价格的降低,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出行成本。据美国 budget360 网站统计,随着生产力提高和汽车价格的相对降低,美国 2013 年的平均收入与平均汽车售价之比达到 1.46,也即每人每年的工资平均可购得 1.5 台中档车。电子设备及邮政通讯的比重从 3.78%上升到 4.55%,随后保持相对稳定,这得益于经济发展带来的计算机、手机等电子产品的普及。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住宿餐饮占比先下降后上升,呈 U 型变化路径。文娱消费在经济发展之初呈现不发达状态,随着经济体进入更高收入阶段,居民的文化娱乐开支大幅上升,而且文化消费随着教育水平、职业层次地位的上升而增加(姚琦、符国群,2017)。其他个人服务的比重略有上升。

表 2 跨越不同收入阶段的需求结构变化

需求类型	所跨阶段 行 业		跨越低收入阶段	跨越中低收入阶段	跨越中高收入阶段
生存型需求	食品 服饰 居住 能源消耗		20.21%	18.75%	13.56%
			6.59%	5.21%	4.33%
			8.41%	10.57%	11.44%
			2.25%	3.89%	4.45%
发展型需求	教育科研	居民消费	4.44%	1.78%	2.35%
		政府消费	5.74%	6.99%	6.57%
		非生产性投资	0.01%	0.37%	0.44%
		总计	10.19%	9.14%	9.35%
	公共服务	居民消费	3.56%	3.46%	4.57%
		政府消费	18.45%	21.30%	21.35%
		非生产性投资	0.06%	0.41%	0.45%
		总计	22.06%	25.17%	26.37%
享受型需求	出行		9.80%	8.49%	6.31%
	电子设备及邮政通讯		3.78%	4.55%	4.40%
	住宿餐饮		6.54%	3.99%	7.36%
	文化娱乐		1.12%	1.53%	2.18%
	其他个人服务		9.05%	8.70%	10.25%

数据来源: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

(三) 需求结构变迁中的趋同性

我们选择 1995 年以后由中等收入阶段跨入高收入阶段的经济体、即后发成功追赶型经济体与目前尚未进入高收入阶段的中等收入经济体,比较这两类经济体在跨越低收入阶段和中低收入阶段时需求结构的变化。

我们首先比较两类经济体在跨越低收入阶段时的需求结构。我们发现,在跨越低收入阶段时,这两类经济体的需求结构存在一定差异(见图 2):

其一,后发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的生存型需求占比总体高于中等收入经济体。在居住方面,两类经济体的差异最大。

其二,后发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在发展初期更加注重满足国民的发展型需求。后发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的发展型需求占到总需求的 37.25%,比中等收入经济体高出近 7 个百分点。从居民与政府承担的份额来看,后发经济体在教育科研和公共服务上的政府消费占比(较浅颜色部分)均高于中等收入经济体,由此可以看出其政府职能在发展初期更加完善。

其三,中等收入经济体的享受型需求占比(32.92%)远高于后发成功追赶型经济体(21.95%)。其中,电子设备及邮政通讯和文娱娱乐需求的比重后发经济体略高一些,而其他部分中等收入经济体的需求占比都超过后发成功追赶型经济体 3 个百分点左右。这可能是因为,后发经济体跨越低收入阶段的时间更早,受制于时代背景和科技水平,高层次的需求尚未产生,从而需求结构更加偏向基础性消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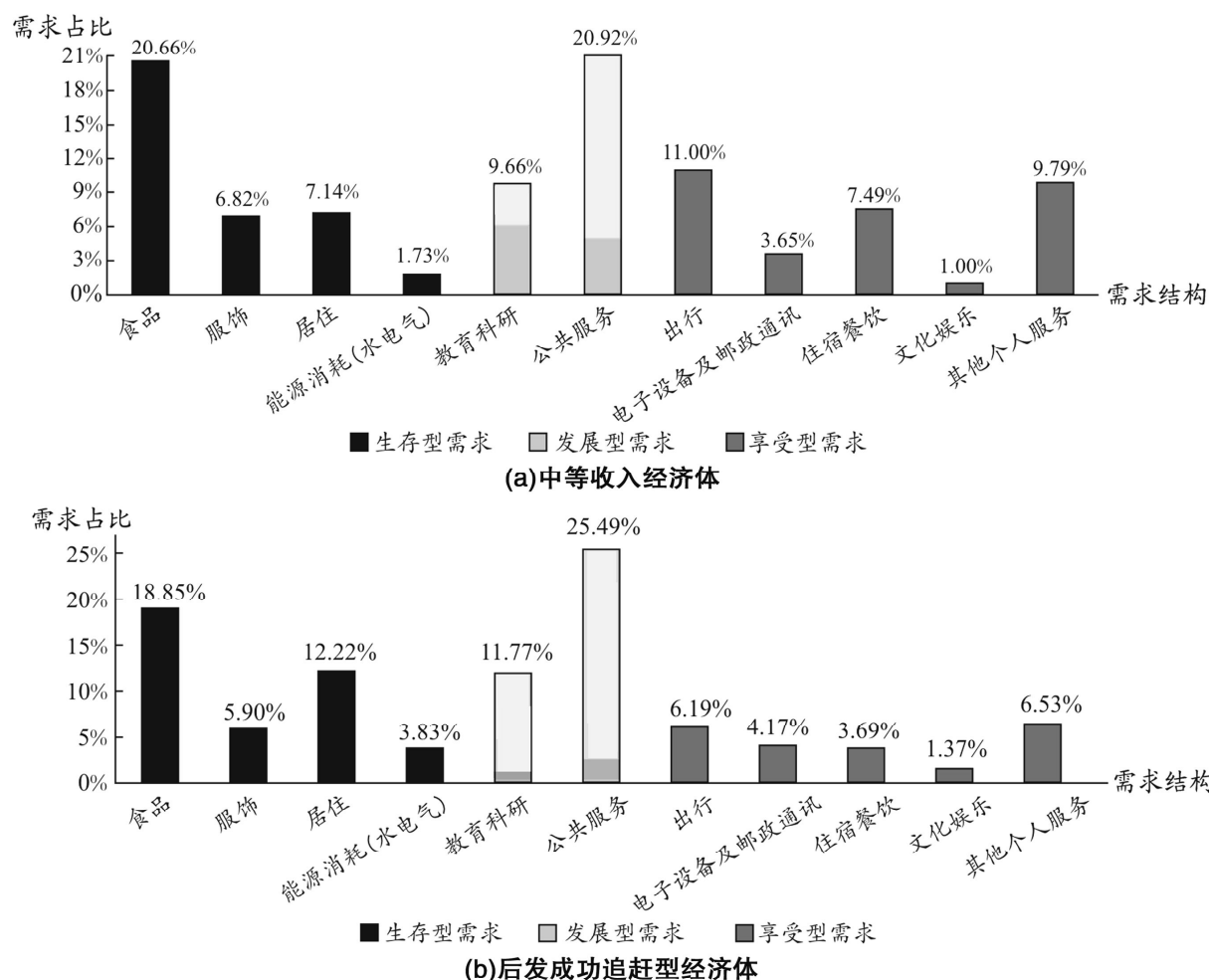


图 2 两类经济体跨越低收入阶段时的需求结构对比

接下来,我们比较两类经济体在跨越中低收入阶段时的需求结构。比较图3(a)、(b)不难发现,在这一时期,中等收入经济体与后发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在需求结构上呈现趋同态势。为了更直观地展示这一变化,我们用后发成功追赶型经济体最终需求的各组成部分比重减去中等收入经济体的相应比重,将两个“跨越期”各部分占比的差值绘制在图4中。可以清晰地看出,除了“电子设备及邮政通讯”之外,两类经济体各种需求比例的差距是缩小的,也就是说,两类经济体的需求结构是趋同的:

第一,两类经济体生存型需求占比的差距缩小。食品需求占比同时下降,并向17%左右趋同,两者差距由-1.81%变为0.23%;服饰支出也向5%左右趋同,差值仅为-0.41%。中等收入经济体的能源消耗占比接近3%,接近后发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在同一时期的水平。

第二,两类经济体发展型需求迅速趋同,差距大幅缩小。其中,教育科研消费占比的差距从2.11%缩小到0.44%,公共服务占比向23%左右趋同。

第三,两类经济体的享受型需求占比之差从11%缩小到8%。由图4可知,除电子设备及邮政通讯外,两类经济体出行、住宿、文娱、个人服务等需求占比差距均有不同程度的缩小。

上述统计分析表明,尽管各经济体的要素禀赋、自然环境不同,需求结构在发展初期存在较大差异,但是,随着收入水平提高,经济体之间的需求结构差异逐渐缩小。这是因为,各国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一致的,因而各国需求结构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而升级的路径也是一致的,具有较好的趋同性和规律性(刘世锦等,20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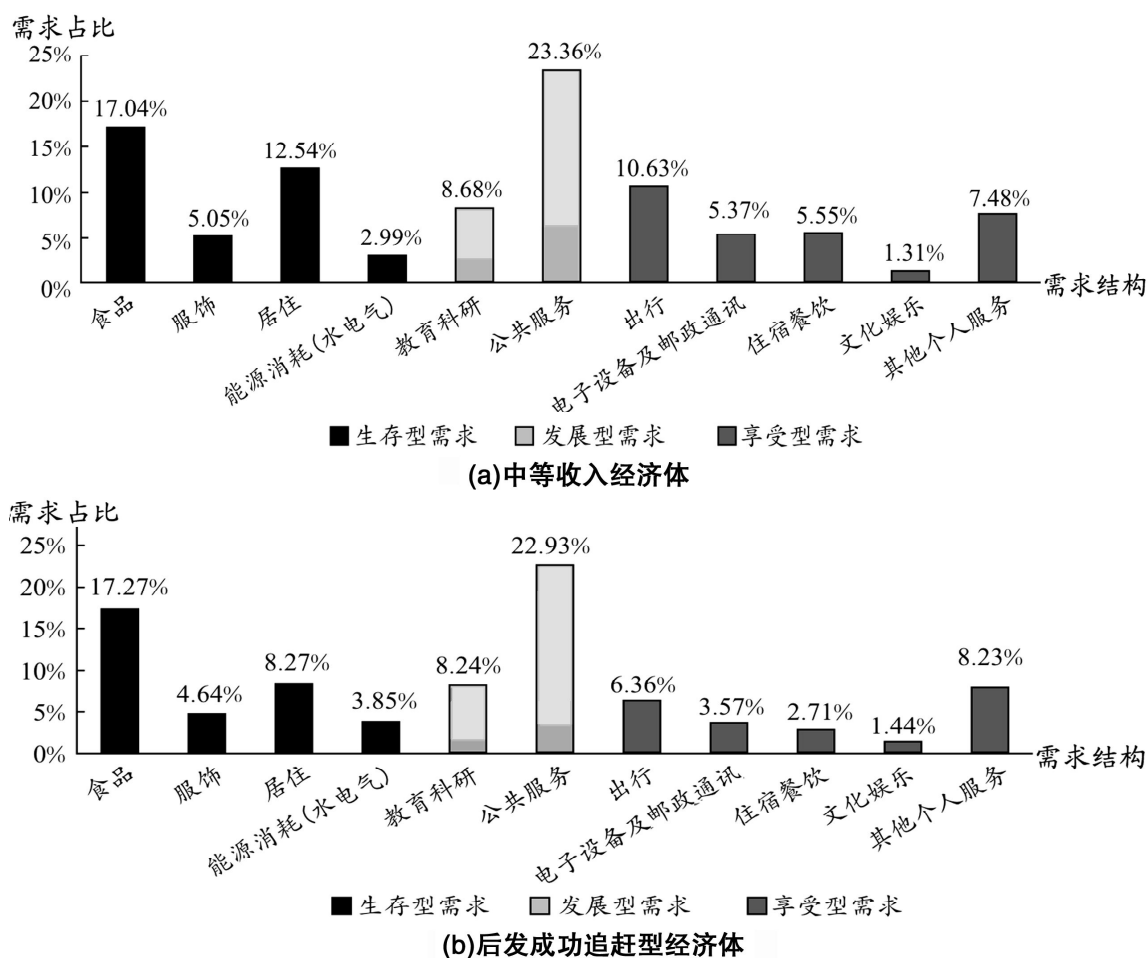


图3 两类经济体跨越中低收入阶段时的需求结构对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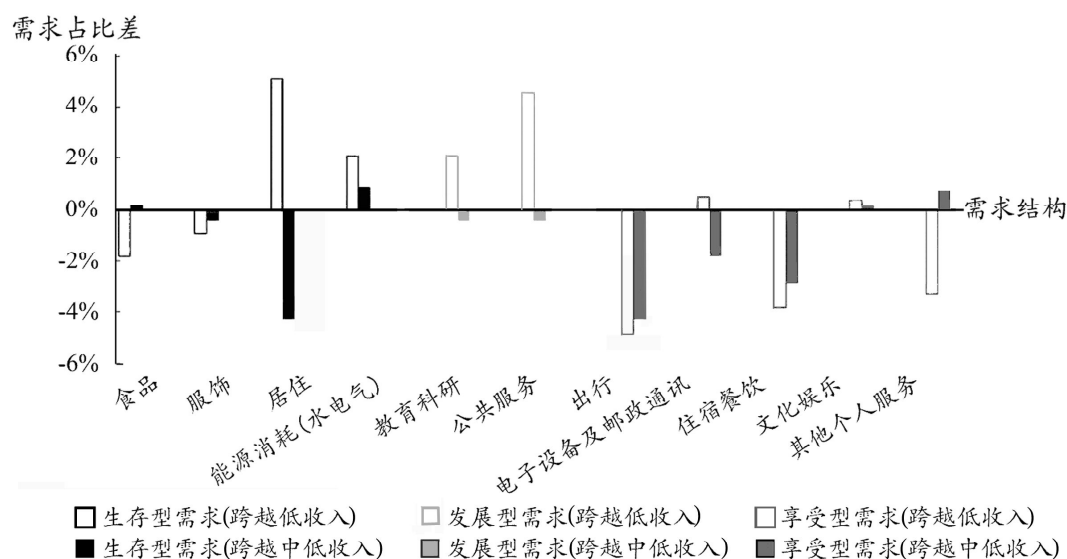


图4 两类经济体在两个“跨越期”需求结构差距的变化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需求结构的趋同与时点无关,只与经济体的发展水平有关。掌握需求结构变迁的这个特征,我们就可以依据后发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在更高发展水平的需求结构特征,对中等收入经济体未来的需求结构做出预判。

归纳了需求结构变迁的基本特征、刻画了不同经济体需求结构的趋同特性之后,我们以此为基本理念,讨论中国的需求结构可能存在什么样的演进趋势。这个问题的意义在于,由于需求结构及其变迁是决定供给结构的重要因素,因此把握中国需求结构的特征及其变迁趋势,可以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方向。我们将中国在跨越中低收入阶段时的需求结构与后发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在跨越中高收入阶段时的需求结构放在同一张图上进行对比(见图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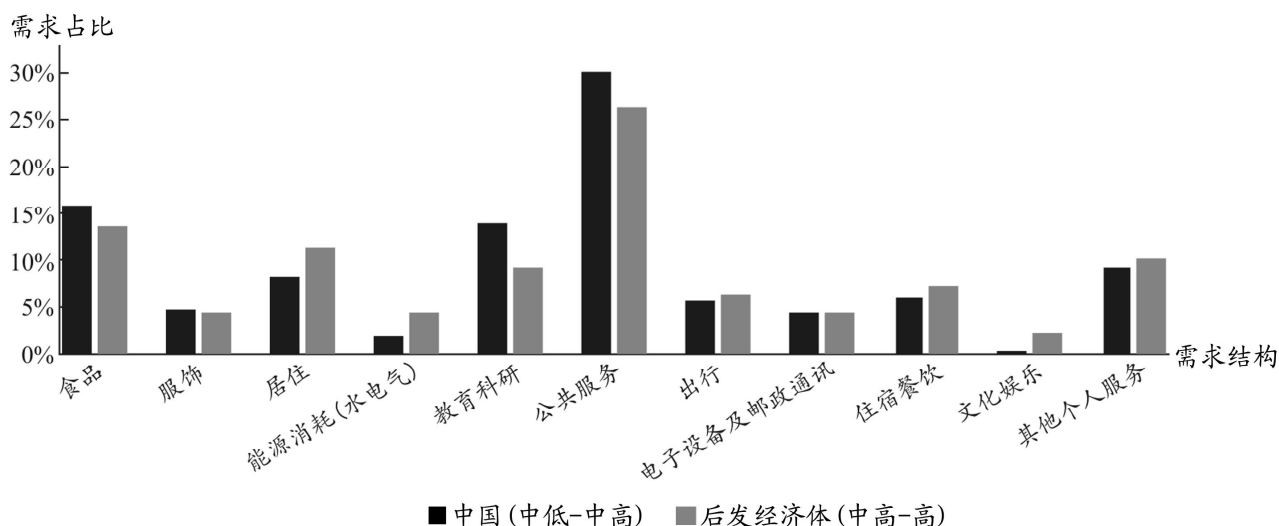


图5 中国需求结构变迁预判

根据图5,可以对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需求结构的变化趋势作出如下大致推断:

首先,中国的生存型需求占比将有所上升。这种上升直接来自于居住和能源消耗需求的较大提升,间接来自于政府在发展型需求支出上挤出效应的下降。居住将逐渐脱离生存型需求、而向享受型需求转变。

其次,中国的发展型需求整体占比将会下降。原来主要依靠政府投资的教育科研和公共服务,随着市场化的深入以及政府投资效率的提高,其占比会有下降趋势(并不等于绝对量停止增长)。

最后,中国的享受型需求占比将进一步上升。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闲暇偏好的上升、以及对专业化服务的需求提高,更多市场外的个人劳动将由市场内服务所代替。

四、结语

研究和分析需求结构的变迁,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与大多数学者不同,本文从长期性的经济发展理论视角、而不是短期性的经济波动理论视角出发,将一个经济体的需求视为对国内和国外生产的终端产品的需求,研究需求结构及其变迁路径。本文利用 WIOD 数据库中 22 个经济体 1995–2014 年的连续投入产出数据和世界银行对国家收入阶段的界定,基于最终需求分析框架刻画了经济体在中等收入阶段需求结构随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变迁,展示了中等收入经济体和后发成功追赶型经济体需求结构的趋同,并对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需求结构的变化趋势作出了大致预判。我们发现:

第一,随着生产力水平提高,生存型需求在最终需求中的比重下降,享受型需求和发展型需求的比重上升。在低收入阶段,三大需求占比从大到小依次为生存型、享受型和发展型。经过中等收入阶段后,发展型和享受型需求占比先后超过了生存型需求,发展型需求成为需求结构的主要部分。

第二,中等收入经济体的需求结构在发展初期与后发经济体差异较大,但前者经过两个跨越期的不断调整优化,最终与后发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呈现“趋同”。这种趋同使得我们可以依据后发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在更高发展水平的需求结构特征,对中等收入经济体未来的需求结构做出预判。

第三,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预计未来中国涉及民生的生存型和享受型需求占比将有所上升,而政府主导的发展型需求占比将有所下降。这也可以视为中国由强政府干预向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转变将产生的需求结构效应。

本文的主要特点是:其一,新的需求分析框架。本文摒弃原先的研究中基于国民收入核算框架来分析需求结构的做法,利用投入产出表构造了 GDFD 指标来刻画需求结构,并在此基础上从更详细、更贴近消费者的角度描述一经济体的需求结构随生产力发展的变化情况。其二,基于各经济体处于相同发展阶段需求结构的相似性,本文抽象掉各经济体经历中等收入阶段的时间差异,将相同发展阶段的需求结构进行跨经济体比较,从而更有利于刻画需求结构演进的一般特征。

参考文献:

1. 黄益平、苟琴、蔡昉,2013:《增长趋势放缓将是中国经济新常态》,《决策探索》第7期。
2. 李建民,2015:《中国的人口新常态与经济新常态》,《人口研究》第1期。
3. 林毅夫,2015:《什么是经济新常态》,《领导文萃》第4期。
4. 刘瑞翔、安同良,2011:《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与转换展望——基于最终需求角度的分析》,《经济研究》第7期。
5. 刘世锦,2015:《GFP 及其驱动的经济增长》,《管理世界》第10期。
6. 刘世锦,2018:《2035: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与路径》,北京,《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18·学术论坛暨博智宏

观论坛》,3月23日。

7. 刘志彪、王国刚,1989:《国民经济核算:我国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界定》,《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第3期。
8. 马晓河,2010:《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需求结构演变与产业结构调整》,《宏观经济研究》第11期。
9. 沈利生,2011:《最终需求结构变动怎样影响产业结构变动——基于投入产出模型的分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12期。
10. 吴丕斌,1991:《略谈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状况的分析与核算》,《经济研究》第10期。
11. 姚琦、符国群,2017:《中国城镇家庭发展类文化消费决策行为的影响因素模型——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性研究》,《珞珈管理评论》第2期。
12. Ahmed, Irfan, Claudio Socci, Francesca Severini, and Rosita Pretaroli. 2018. “The Structures of Production, Final Demand and Agricultural Output: A Macro Multipliers Analysis of the Nigerian Economy.” *Economia Politica* 1:1–49.
13. Comin, D. A., D. Lashkari, and M. Mestieri. 2015. “Structural Change with Long-run Income and Price Effects.” NBER Working Paper 21595.
14. Echevarria, C. 1997. “Changes in Sectoral Composition Associated with Economic Growth.”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38(2):431–452.
15. Kongsamut, P., S. Rebel, and D. Xie. 2001. “Beyond Balanced Growth.”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68(4):869–882.
16. Maslow, A. H. 1943. “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50:370–396.
17. Timmer, M. P., E. Dietzenbacher, B. Los, R. Stehrer and G. J. de Vries. 2015. “An Illustrated User Guide to the World Input – Output Database: The Case of Global Automotive Produc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3(3):575–605.

The Change of Demand Structure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Cross-Economy Comparative Analysis in the Middle-Income Stage

Qu Yiwei and Zhang Ying

(1: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hool, Wuhan University;
2: Management School,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Studying and analyzing the change of demand structure is considered an important prerequisite for government to promote structural reform on the supply side. To overcome the defects of popular national income accounting framework, this paper focuses on quantify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emand structure change among economies in their middle-income stage, by establishing the framework of final demand analysis. Based on long-term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paper exploits the continuous input-output data among 22 economies from 1995 to 2014 in the World Input-output Database (WIOD). Result shows that the demand structure of each economy is constantly upgrading during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growth and development, which indicates the transition from survival demand to developmental demand; The demand structure of middle-income economies is similar to that of successful catch-up economies; With the deepening of market-oriented reforms,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proportion of China's survival and enjoyment demand in the total demand will increase in the future, while the development led by government will decrease.

Keywords: Middle – Income Stage, Final Demand, Demand Structure, Cross – Economy Comparison

JEL Classification: N30, O57

(责任编辑:陈永清)